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

——以 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肖 恽^①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玲 30 年代的作品, 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 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 20 世纪 30—40 年代, 潜抑于 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 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 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 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玲; 政治话语; 女性立场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432(2007)04-0031-04

The Interweaving and Dispersion of Gende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DING Lings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30 s-1940 s

XIAO Yi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 viewpoint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China holds that DING Lings works in the 1930 s marks her change of creation standpoint. As a matter of fact, even though political belief and philosophy was exalted to a very high position in the 1930 s and 1940 s, DING Lings latent gender awareness and female thinking were interwoven with her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The works created when DING stayed in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and Yenan illustrate that she tried to voice on behalf of women in the limited discourse space.

Key words: DING Lings; political discourse; feminine standpoint

作为五四后期步入文坛并与左翼文艺界有着密切关系的知名作家丁玲, 追溯其创作的历程, 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条女性意识若隐若显的线索。1929 年, 长篇小说《韦护》的诞生, 学界有人认 为这部作品标志着丁玲创作转向的开始。但结合左联时期的一些文本加以分析, 我们应辩证地看到, 即使是在高扬政治理念的同时, 丁玲也并没有完全关闭她一向擅长并重视的性别视角, 那锋芒犀利的性别意识并没有从丁玲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到延安后, 从 1940 年至 1942 年, 丁玲先后创作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和《三八节有感》等一系列作品, 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政治权利话语潜抑中的上扬。纵观这两个时期的创作, 我们不难发现文本的深处始终有两种话语在相互撕扯。不可否认的是, 性别话语与政治、革命、阶级话语之间虽有着相契合的一面, 同时也有着不相契合的一面。

正是这不一致的一面, 才使女性需要一种相应的文化表述来呈现自己的特殊生存、精神处境。丁玲敏锐地观察到, 由于以政治革命问题替代性别问题的观念变化, 致使性别意识、性别差异以及性别话语遭受到压抑乃至湮没。以下, 笔者试图通过对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的阐释, 探讨丁玲如何从女性的角度试图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自己的声音。

丁玲带着《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已是“五四”落潮时期, 在其早期作品中, 她塑造了一批具有独

① 收稿日期: 2007-04-26
作者简介: 肖 恽 (1979-) 女, 湖南邵阳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 2005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立精神的新娜拉们,她们独特的女性的体验和对自我的审视凸显了丁玲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毫无隐讳地向世人展示了觉醒后女性的内心世界,甚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女性对正常性欲的诉求。但随着时代的递嬗,到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个性解放的思想逐渐被社会解放的思想所代替,“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1](P208)}与此同时,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文学作品也已崭露头角。而那份独属于女人一己私语、徘徊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挣扎、彷徨于无性的困惑和生命流露出的无力,显然不符合正悄然发生变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这种变化表现在追求个人的小我到追随革命的大我之间的替换。

这种变化在文学上的反映,如果说前几年写恋爱的主题具有反封建礼教和伦理的“革命”意义的话,那么现如今恋爱的主题已变成不那么革命的灰色情调,这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否将直接影响着革命时期文学文本价值的高低。当时最具范式意义的文本便表现在革命文学早期流行一时的“革命+恋爱”的模式抒写上。这期间丁玲的小说创作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向,昔日那种犀利的女性视角与夺目的话语主体姿态开始有所收敛。造成这种转向的因素是复杂的,除了丈夫胡也频的去世对她的影响外,恐怕还与丁玲的个性以及她试图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出路不无关系,这可以从她平时的言行中看出端倪。早在1923年,有人要介绍丁玲加入共产党,“她说:‘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她问瞿秋白,我参加党,你觉得怎么样?瞿秋白说:“你嘛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她觉得瞿秋白是理解她的。^{[2](P157)}从这句话来讲,丁玲创作的变化与其说是被革命所深深吸引,倒不如说是因为革命的到来为她的创作带来了某些新鲜刺激的元素,可以通过寻求另外的路径来实现她创作的转机。

1929年底,长篇小说《韦护》诞生,正是“革命+恋爱”的模式流行的时期。这种流行,“事实上相当症候性地显示了从五四时期的‘恋爱自主’模式向革命文学时期的‘普罗文学’转变的意识形态的内涵”。^{[3](P1205)}丁玲曾提出自己写《韦护》并不是想赶“普罗文学”的时髦,但“不自觉”地掉到“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而《韦护》作为丁玲“转型”后的第一部“有意为之”的作品也的确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叙事要求,即为了社会的解放,个人的幸福是应该退而求其次的,把凡是影响到革命进程和集体利益的一切都视为不道德而应受良心的谴责,因而在写作的策略上人为的设置了革命和爱情的无法调和。带着这样的观念来演绎的创作,使得文本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让人断定曾经那个高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莎菲”已经完成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了。然而,即便是丁玲在理论预设中依循了当时革命文学的叙事原则,但在潜意识中却仍保留了她审视男性政治的性别化立场。作品中有这么一段:当韦护对如何选择感到困惑的时候,他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你又要爱

我?”丽嘉回答说:“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有过一些言论,批评过一些马列主义者,那是我受了一点别的影响,我很幼稚,还有,就是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也就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这个有着“莎菲”气质的女子确实有让人感到意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她一语击中了那些套着革命外衣而大行非革命之事的伪革命者,但韦护的人格魅力却深深的吸引着丽嘉,因为爱着革命的韦护,所以才敬重韦护所敬仰的革命。在这里,革命与爱情通过隐秘的渠道完成了话语转换,从而将革命与女性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韦护与丽嘉的爱情在革命同事犀利目光的审视中变成了令人不齿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革命者韦护的道德“软肋”,致使矛盾痛苦的韦护最终以革命的名义将丽嘉抛弃。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一个真相:男性是为了理想中的革命抛弃爱情,而女性却为了理想中的爱情选择革命。女性一生追随的是自己真挚的感情,这在作品的结尾也有所明示,被爱情抛弃的丽嘉要去找韦护,要“好好做点事业出来”。这样的情感流露反倒显示出革命者薄情寡义和革命理念的空洞苍白。我无意质疑丁玲对革命的真实情感,然而,真实又往往被很多东西所掩盖。从韦护痛苦地徘徊在革命与爱情之间,从作者那无限伤感的笔调中,潜藏着作者对革命本身的反思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难道革命在承诺解放大众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同时,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为代价?难道革命在为女性寻找新出路的同时又以新形式的带有同样强烈的性别规范将其禁锢?这时的丁玲,虽然写的题材已经向革命靠拢,但她理想的生活方式以及感受方式还是莎菲时期的。对她来说,革命不是那冷冰冰的政治理念和说教,在内心深处总流淌着某种暧昧不明的情愫让人无法释怀。可见,丁玲在理性追求“革命+恋爱”模式的同时,却在具体的文本实践过程中泄漏了自己真实的情感倾向,使得文本生发出另一层意义空间。

此后,丁玲于1930年春写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仍是《韦护》创作思路的延续。在理念同构下的这两篇小说与《韦护》一样,结局都是革命的一方(韦护、美琳、望微)抛弃了不革命的一方(丽嘉、子彬、玛丽),革命者既心存眷顾,又义无反顾的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革命的理念最终战胜爱情的缠绵。在这些人物中,玛丽这个形象的刻画特别耀眼。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是一个淡漠革命事业,沉迷于个人爱情,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但活得依然很有自信的这么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如果说丽嘉在最后为了爱情还有投入革命的可能的话,那么玛丽则显得异常独立,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革命的理念在个性主义的玛丽面前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设置了一个富意味的亮相:在大街上参加游行的被警察抓住的望微,“突然看见大百货商店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那是玛丽!她还是那样

耀目,那样娉婷,恍如皇后。她还显得那么快乐,然而却不轻浮。”不革命的玛丽活得依旧滋润风采,没有因为不觉悟、落后而被丑化,这是否可以说明潜意识中站在个性主义和女性立场的丁玲肯定了玛丽的自我选择以及对选择的坚定态度。玛丽的形象再一次旁逸出丁玲的理论预设,也就是说,在高悬革命旗帜的左翼文学中,在追求时代的“大我”而不顾“小我”的历史环境中,在把爱情设置为革命的阻力,女性角色降至次要地位的文学语境下,玛丽依然是丁玲笔下的“莎菲”个性——寻求自我解放,寻求独立意志,不依附,不盲从。

由此可见,丁玲在左联时期的作品并不像学界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走出了‘莎菲’而走向了‘革命’,放弃了原有的女性立场而走向了革命叙事,将时代女性的苦闷绝叫变成向广大社会寻求阶级解放的宏阔主题”。^{[4] (P77)}虽然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她一定会提倡一些东西,但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并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可见,在她的创作介入革命伊始,就与自身的创作个性产生了难以弥和的裂隙。

二

1936年,经过了国民党三年幽囚生活的丁玲追随着丈夫生前的信仰辗转来到了陕北。在她准备踏上陕北这块热土之前,就对它寄予了最深的渴望,“我要到我亲爱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1] (P18)}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延安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圣地,更是一个开拓生命新天地的地方。事实上,1942年前的延安的确是一个政治生活和文艺生活比较宽松的地方,使得作为一个作家的丁玲所向往的那种自由书写的生命状态得到了尽情地挥洒。从1940年至1942年,丁玲就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和《三八节有感》等一系列以性别眼光、性别意识进行艺术构思的作品。这种独到的眼光和思考角度也更符合丁玲为人、为文的风格,因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一直是她创作的重点。此时,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1] (P38)}

1. 延安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医院中》陆萍的出场使人印象深刻,当她被组织上派到一家医院工作,在第一天与院长见面时,那位老革命出身,但不懂医务的医院院长“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重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于是不再望她了。”这位延安的革命男性在将陆萍异化成一张等着被他签收的草料收据时,也就暗含了延安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在延安这个“拥有法律规定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但不

不拥有作为女人的尊严权利”的地方,“中国文化蔑视女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介入、阶级的消灭而自动消除”。^{[7] (P17)}在男女平等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延安女性的地位还是如“草料”般低贱。

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了一个被侮辱受损害但又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女性形象——贞贞。为了革命而一次次遭受敌人侮辱并为此付出个人健康的贞贞,本应受到革命的保护和礼赞,但打上男权道德印章的女性身体却仍无法被世俗社会所包容,反遭致道德的责难。在“霞村”这个地方,作者刻画了一群“无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的望着”,“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大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在这一点上,丁玲延续了“五四”以来知识者对国民性的探索和批判,从而与革命战争年代对人民大众“神圣形象”的抒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政治话语和女性话语相交织的作品,作者“我”一方面肯定贞贞为了革命的利益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演绎的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包括出卖自己的身体的政治理念的男性视角。另一方面又对女性贞贞贞贞并不被世人理解反遭致各种无礼的谩骂和鄙视的现实处境深表同情和隐忧,即典型的女性关怀视角。又由于我对贞贞处境的深深担忧便赋予了文本某种超越性的意图,其中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的意义之间暗含的某种的对抗性使文本从革命叙事的窠臼里凸显出丁玲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

2. 延安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处境

延安的妇女是处于一个传统社会的变革时期,她们相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她们不仅有法律的政治保障、独立的经济支撑,小米南瓜也把她们养的红润强健,然而这幸福的感觉与实际的情形却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8] (P383)}正是这种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遗毒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文化蔑视女性的传统并不因为革命延安消灭了阶级剥削、贫富差别,倡导所谓男女平等的制度而顷刻消除;此外更是基于女性自身的体验,使丁玲敏锐的觉察到革命的政权非但没有变更传统的家庭结构,反而女性角色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高度政治化的地区愈加变得尴尬难堪。因此才会有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令当时许多人都深感骨鲠在喉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其背景就是“延安的两起离婚事件,从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9] (P35)}“想到女同志日常结婚、离婚、生孩子引发出来的一大堆问题,而在延安,妇女问题不会解决得那么完美,便写成了《三八节有感》。”^{[9] (P31)}在这篇文章里,丁玲以延安女同志的婚姻、生育问题为叙述的切入点,从而把具有儿女情长的家务事与解放区的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放

在了同一解剖台上。由此,我们可窥探出在同一语境下女性话语受到了主流话语怎样的压抑和湮没。

细读《三八节有感》不难看出丁玲对延安女性婚恋状况的艰难进行了非常全面地呈现:

结婚是问题,不结婚更成问题,还会成为各种谣言攻击的对象;结婚后为了生小孩和操持家务而退守在家,日子一久就被爱人嫌弃斥为“落后”,并以此成为男人离婚的口实;如果女人唯恐“落后”而“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生了小孩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其结果还是不能免除“落后”的骂名;离婚在延安很普遍,但“多半是男性”,如果是女性提离婚,“那一定是不道德的事,完全该女人受诅咒”;即使是因嫌恶自己的妻子欲将其抛弃,却要将其打上“落后”的幌子来给自己正名。殊不知这些“落后”的妻子们当初是多么的革命和“进步”,她们为了家庭、丈夫、子女才被逼着做“回到家庭的娜拉”一族,这些重重的身份也因此妨碍了她们继续革命,继续充当“先进”的可能。深究下去会发现,在以妻子“落后”为离弃理由的男性话语背后,隐藏着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则以符合主流社会政治话语的“革命”与“先进”标准来作其强大的支撑,而标准的制定恰恰是由革命主体力量——男性革命者赋予的,女性则依然处在被言说、被定义、被指认的位置。她们无权在婚恋、生育等切身问题上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们从身体到精神都无法绕开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下的“合法”范围。面对延安女性在婚恋家庭结构中尴尬艰难的处境,丁玲无不沉重的写到:“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这份由己及人的感慨不仅因为它独到的性别关怀而大放异彩,还因它是无法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性别体验而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说《三八节有感》是从理论上总结了延安家庭婚恋问题的话,那么小说《夜》则通过何华明和他老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生动的演绎。小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年老色衰又不能再生育的村干部老婆与丈夫之间的“隔阂”。丈夫何华明在政治层面的确称得上是革命的好同志,他为了忙村务而撂下了本该播种的自家的土地,自家的牛要下崽也忙的顾不上,凡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东西,他都无法顾及。但在个人的家庭婚姻方面他却远不及政治上那么有“觉悟”,他以老婆太落后的政治理由和不能生育的道德要求为借口盘算着离婚的理由,其实质是为了掩盖自身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状况,这可以从他对地主女儿清子和妇联会委员侯桂英的欲望想象中窥探得出来。小说以何华明的男性视角切入文本,向我们明示了:在解放区的两性关系中,男性依靠其优越的政治资本控制着对女性

“落后”与否的绝对掌控权,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掌控了女性的命运。小说对处于性别弱势中的何华明老婆的悲惨境遇不时投以关注的目光,使得文本在霎那间泄露了作者真实的用意——把男性视角纳入到女性视角的强烈反视中,从而更好地反映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

《三八节有感》和《夜》中“落后”妻子们婚姻被弃的现实处境,深刻反映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政权并没有变更传统的家庭结构。丁玲以其女性的直觉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延安政权中的女性尽管在社会政治权利层面得到一定的提高,然而在性别意识、性别差异等方面还是受到压抑。换句话说,延安妇女还依然是一群被剥离了主体性别感受的在某种程度上只作为异化的对象而存在。“说她们‘落后’,其实是她们的身体落后于革命的丈夫‘不断前进’的性爱要求,落后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婚姻关系。”^[7](P20)

丁玲逝世距今刚好整20年,回顾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没有哪个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能有她那么强烈和炽热,哪怕是在左联和延安那么一个特殊的时期,哪怕是她自己刻意要用政治意识来指导创作的最明显的作品中。读她的作品,永远都不要停留在她“要说什么”,而应该问她“想说什么”。对于一个一生都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女作家,不论她的内心曾有过怎样的汹涌,我始终相信,在她作品的深处,总还有另一个别样声音在不断回响。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刑小群.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 [3]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J].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
- [4] 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1).
- [5] 丁玲.魑魅世界 风雨人间——玲的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6] 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J].齐鲁学刊,2000(5).
- [7] 常彬.延安时期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1).
- [8]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M]//玲文集: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9] 良沛.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黄声波 英文译校:文爱军)